

广义“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观的演变与整合

王 润

摘 要：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与5G新技术的出现，使传播媒介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比较和分析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和欧洲媒介化研究学派的异同，考察了两种“媒介环境”观研究范式和“媒介”内涵的演变，前者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科技生态范式，后者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范式；现代社会背景下，媒介与社会环境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两个学派具有前后的延续性与互补性；文章最后通过提供“媒介化”过程的五个层次来整合两种“媒介环境”观，试图构建广义的“媒介环境学”，重塑对“媒介环境”的认识。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化；媒介环境；范式

作者简介：王润，男，讲师，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4-0053-07

如今，“无处不在的传媒成为当代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社会也在传媒的发展、扩张、弥漫和渗透之中不断建构和重构”，^[1]“媒介正在以不断变换的方式将世界置入我们的日常事务中”。^[2]这些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似乎构成了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变迁的普遍刻画，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5G新技术的出现，传播媒介已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传播学学术流派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在美国高校开设课程，即标志着将“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研究的开始；而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讨论传播研究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转向，其中心意旨也试图揭示出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以媒介运作为逻辑的社会形态特征。^[3]这两个学术流派有何异同，以及如何理解媒介环境学派强调的“作为环境的媒介”到传播研究“媒介化”的转变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比较分析两种“媒介环境”观的研究范式和“媒介”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性地提出了广义的“媒介环境学”，并试图全面理解现代社会的“媒介环境”，深化对北美环境学派与欧陆媒介化学派的勾连与整合。

一、北美媒介环境学视角中的媒介与环境

说到传播学对媒介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北美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环境学派是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延续早期媒介环境学派先驱的思想，媒介环境学的重要奠基人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创立媒介环境学课程时指出，“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4]因而，媒介环境学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考察，将“人、技术和文化的三角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泛环境论著称，主要旨趣在技术和媒介对人和心理的长效影响”。^[5]值得关注的是，媒介环境学对媒介之于人和社会影响的考察，着重体现在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们思维和感知的塑造上，矫正了以往经验学派独霸、批判学派式微的传播研究现状。

该研究视角一方面反映出媒介环境学派吸取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媒介技术对人类感官影响的基本观点。^[6]媒介环境学派重要人物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认为“一切技术都是肉体 and 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并且“人在正常使用技术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7]这预示着人类通过技术革新延伸人体的一部分发明媒介，并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影响到人类的感知。而事实上，在麦克卢汉之前，芒福德、伊尼斯也从技术与文明的关系、媒介与传播的偏向等视角提出“技术进步的人性化”^[8]“技术偏向的时空感知”等观点，^[9]媒介技术对社会感知的影响成为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传输和解码，以形成特有的偏向，并促成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因此，当传播媒介成为社会环境，以媒介环境学视角对媒介技术进行考察时，最初是以技术和符号的社会感知作为认识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媒介环境学创立之初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受到生物学生态（ecology）概念的指引，媒介环境学强调媒介与人互动产生平衡而健全的环境，以促进文化的象征性平衡。^{[4]（44）}当传播媒介作为环境在社会中予以应用，该学派重点在于协调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把维持媒介与人的动态平衡关系视作最终的归宿，突出符号、媒介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强化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麦克卢汉也曾指出，“一种新技术让我们的一种或多种感官得以延伸，并在社交世界拥有得以外化的具体表现时，那么我们所有的感官将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新的平衡比率。”^[10]可见，媒介环境学派反思媒介技术的工具论，试图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传播异化，将生态学的理念和文化价值观放置在特定的媒介技术环境下思考，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处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希望最终形成媒介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无论是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的影响，还是媒介技术与人类的人文主义关怀，宏观地看，媒介与文化是媒介环境学考察“作为环境的媒介”的一对重要关系：媒介作为人们的外部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强调社会和文化对媒介感知的平衡作用。媒介环境学强调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开辟了结构和互动关系中动态考察媒介的视野，所倡导的协调、平衡观念是作为最高的前提存在的，回应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生态主义的政治话语。^[11]因此，媒介环境学契合了“生态”概念最基本的内涵，赋予作为环境的媒介与文化价值观的生态平衡、和谐与稳定，提供技术生态主义的构想，旨在关注媒介本身如何影响社会 and 人的发展，使之区别于传播学研究的其他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12]

然而，这一学派也具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比如过于偏重科技生态的呈现，而缺乏对生态问题中作为核心话语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方面的系统论述，导致对生态认识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弱化，从而忽视了媒介主体的作用。同时，由于该学派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因而也就将媒介技术作为社会影响的前提，而人类和文化对技术的反应则仅是作为系统调适和平衡来运行。即使媒介环境学研究“不否认多元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也不否认人与社会在媒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13]但建立在技术生态论基础上的技术反应与调适是有限和脆弱的，科技人文主义浪漫式的想象背后缺乏的是对媒介技术形成的社会脉络和技术实践中权力因素的考量。技术与文化的互动机制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成为媒介环境学派难以解释的对象，因此，政治经济力量 and 媒介主体能动性的缺失成为从媒介环境学视角理解媒介技术与文化关系时天然的缺陷。

二、欧陆“媒介化”视角中的媒介与环境

近年来，欧洲学界兴起的“媒介化”专题的讨论，成为理解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又一概念。

研究者将“由媒介运用而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转型，并以适合媒介再现的方式而呈现的过程”称之为“媒介化”，该概念重新审视了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媒介介入社会进程，甚至重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的制度化实践。^[14]因此，也就将传统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环境转移到当下的“媒介化”环境之中，由“媒介作为环境”过渡到“媒介化”环境/媒介化社会的演变。

尽管“媒介”环境和“媒介化”环境都离不开媒介技术作为传播和扩散的最基本前提，但“媒介化”概念不仅在于强调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和平台，更在于强调现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生产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15]特别突出媒介具有促成不同社会生活或相关领域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媒介逻辑成为当代社会逻辑的一部分。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也指出“媒介化”被用于描述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即媒介对其他社会制度或系统施加特殊的主导性影响。^[16]在媒介化环境中，媒介已经不再是处于被支配和信息中介的角色，而是成为社会或文化变迁的能动实施者，媒介被进一步整合进入相关领域，成为主体以媒介逻辑予以运作后的存在。

“媒介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试图将特定的媒介科技形式的使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与更广阔的社会过程接合，且更强调前者（媒介）对于后者（社会过程）的介入或干预”。^[17]而媒介的这种介入或干预成为现代媒介化社会公众认知与架构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框架，揭示出媒介在再现和建构世界的过程中自然化地成为社会的中心，形成围绕媒介中心而产生的社会逻辑。^[18]的确，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情境的再现日益需要通过媒介形式予以呈现，媒介在作为建构世界的独特机制以及形成公众认知的社会框架方面，起到基础的中介作用，同时公众能动地借助于媒介逻辑的运作使媒介与社会处于互构和再生产的关系之中，从而促进媒介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塑。

与传统的媒介环境学派不同的是，媒介化研究弥补了以往媒介研究的缺陷，即“媒介不再是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存在，而是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发生着影响”。^[19]“媒介化”环境中的“媒介”不再是媒介环境学中线性单一的、依附在人类感知和文化目的之下的媒介技术，而是体现出“媒介与社会建制的互动过程”，媒介的技术形式在社会动态过程中与既有的社会建制发展出复杂的互动关系。^[17]媒介技术与社会场域之间形成相互的勾连，技术背后的主体能动地参与和建构媒介，主动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与社会世界，参与到社会进程之中。

“媒介化”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类互动实践与媒介技术相关联的考察对象，^[20]摆脱了以往技术协调式发展的科技生态论，媒介使用主体的社会实践打破了技术平衡观，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断被重塑，并处于深度地互动和建构之中，形成了在媒介化进程中依托媒介技术而形成的社会实践。此外，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媒介域”（mediaspheres）概念也类似于“媒介化”的研究取向，都在于讨论技术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结构，考察“参与符号生产和事件生产的相互交织的中介实体和动力程序的关系逻辑”“把技术变量作为 agency（能动）来考虑，技术配置和主观意图相结合、行为和再现相统一的技术文化同时触摸社会心理的边界”，^[21]强调技术演化与信息发送、接收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过程。

因此，媒介化研究的技术和社会建构论思想将媒介应用背后的主体能动逻辑引入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生态观点，其考虑到媒介与社会权力、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让技术的应用主体处于媒介环境之中，能动地进入到媒介的社会建构进程之中，从而实现“媒介与社会建制的互动”。

三、两种“媒介环境”观的范式与内涵差异

媒介环境学和“媒介化”研究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前者强调

“作为环境的媒介”，后者强调“媒介与社会建制的互动”，两种视角在学理上呈现为研究取向的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把媒介视为社会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媒介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并产生影响。现代社会正处于“媒介”环境和“媒介化”的社会形态中，如何理解与认识两种不同的“媒介环境”观，以及两者对“媒介”的认识和研究取向又有何不同？

（一）两种“媒介环境”观的研究范式

从研究范式来看，两种“媒介环境”观具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旨趣。传统的媒介环境学派延续了人类生态学理论学家霍利（Hawley）关于社会环境与社会系统的认识，特定环境中整体相互依赖的单位，彼此建立联系以适应相应的功能，技术的增长和进化会与其他技术或文化形成均衡，达到平衡的状态。^[22]这种研究传统以结构主义为基础，沿袭功能主义的传统，将任何一种环境均视为一种结构，每一种结构都有约束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法则。^[23]可见，传统的媒介环境学研究范式中，媒介是外部社会结构的因素，而文化的感知与调适是外部的法则，体现出作为结构的技术与作为外部约束机制的文化之间的平衡与制约关系。结构功能主义取向试图想要建立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平衡，与人类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所倡导的技术生态主义理念不谋而合。^[24]放置在传播活动中，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把传播结构视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践的功能性结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特征在传播结构中趋于消失。^[25]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改变了（结构）功能主义者视野中将“结构”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状况，而将“结构”理解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在实践活动中导引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吉登斯所称的结构是规则和资源，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并“内在于”人的活动中。这里结构变得不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可以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26]在以往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这对关系中，媒介技术作为社会结构对社会产生影响，被视为脱离于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即使媒介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和符号感知作用也是以媒介技术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一部分为前提的。而结构化理论则认为规则与资源在社会系统中的实践与互动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媒介技术不再只是人们施加行为的对象，而是媒介在人们实践活动中能动的过程，通过和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中得到组织。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反思性成为人作为主体从事社会实践的重要特征，而这种反思性体现在传播活动中则是行动者（主体）按媒介逻辑进行运作的传播实践活动。

当然，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媒介”的复杂性在于其具有双重属性：媒介（技术）不仅是作为社会结构的中介载体，同时又是人们能动地实现相关社会实践的对象。媒介化研究正是注重考察媒介环境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媒介化”的现实情境与日常生活的建构，以及主体进入到媒介建构的进程中逐渐成为按媒介逻辑进行社会运作的制度化过程。因而，媒介化的研究取向具有社会建构论的色彩，媒介技术（结构）与社会行为是互构和再生产的过程，媒介成为人们按媒介逻辑进行社会实践的对象，在媒介运用过程中体现出人对“媒介”的反思性和能动性特征。

（二）“媒介”概念的不同内涵

当然，对不同“媒介环境”观的认识，也体现出对“媒介”概念不同内涵的理解。传统媒介环境学中的“媒介”，把“媒介作为环境”，媒介是人体感知的延伸，无论是作为技术意义上的媒介，还是作为隐喻意义上的媒介，媒介（技术）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视角理解“媒介”的特性，媒介（技术）不仅是作为人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是构造出人与技术的一种新关系参与到事物、自然和世界的构建中，体现为技术（媒介）与主体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27]因而，“媒介”弥漫于人们经验世界的所有努力中，成为人们在世存有的“中介”，是一个容纳人、技术、权力和资本要素的“行动场域”。^[28]因此在传统媒介环境学研究中，媒介环境和文化对人类媒介感知的协调与平衡是重要的调

和方式，体现为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技术文化的调和统一。

而“媒介化”研究中的“媒介”则体现出新的内涵和延伸，“媒介化”概念一方面被视为制度化过程，“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16](21)}使媒介的角色以独立的社会力量形塑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建构特征，将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化视为主体与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人们通过与媒介的互动来改变其建构社会的方式。如克罗茨（Krotz）将“媒介化”视为“元过程”（Meta-process），媒介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建构紧密相关，“媒介化”的动态过程建构起与全球化、个体化、商业化并行发展的社会趋势。^[29]无论是“媒介化”的制度化过程，还是社会建构特征，“媒介化”反映出人、技术、权力、资本等要素在“物化”装置中的相互汇集与互构的过程。

在媒介化进程中，“媒介”不仅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与技术文化的调和，而且还将这种存在方式发挥到极致，媒介背后的主体（人类）能动地介入到媒介的建构过程中，容纳各种要素的“行动场域”动态地整合与互构，彼此渗透和再生产，体现出“媒介”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此外，库尔德里提出的媒介研究的新路径，更是强调“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30]这种对“媒介”的认识从“作为环境的媒介”到“作为实践的媒介”（media as practice）的转向，使得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揭示出现代社会媒介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属性，也体现出两种“媒介环境”有着不同的“媒介”观。

综合两种“媒介”的内涵，以在世存有观念去理解“媒介”，“媒介”都是人经验和投身世界的一切技术与非技术中介物，是以介质为基础的载体而存在。而媒介环境学与“媒介化”研究中“媒介”的差别在于容纳各种要素的“行动场域”和“行动场域”内部不同要素的互构之间的区别，这体现出作为存在主义的媒介环境观与作为互构实践的媒介环境观的差别。两种“媒介环境”概念，虽然同中有异，但均以“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呈现为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内涵具有互补性与延续性，反映出“媒介环境”的不同面向。

四、整合与建构：广义的“媒介环境学”

研究范式和对“媒介”概念内涵的不同认识厘清了两种“媒介环境”观在研究取向上的演变与差别，事实上，正是近年来欧洲学界兴起的“媒介化”研究开启了对于“媒介环境”新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理解“媒介环境”成为可能。笔者试图整合传统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与欧洲的“媒介化”研究，建构广义的“媒介环境学”。

胡翼青等将媒介化社会理论视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线索梳理了芝加哥社会学派从布鲁默、戈夫曼、布迪厄到媒介化理论的延续与变形，梳理了芝加哥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将结构纳入行动的考察之中，并与符号互动论整合在一起，从而提出重新理解传统的芝加哥学派。^[31]这种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芝加哥学派作为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对社会系统的运行做了整体上的宏观学理架构，研究议题包罗万象，势必涉及到传播媒介及社会互动的多个方面，因而当前欧洲学派所讨论的媒介化理论追溯到芝加哥学派自然有相应的理论渊源。然而，这种追溯的局限性也在于：一方面，其忽视了将媒介技术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加以延伸讨论，而这正好是媒介环境学派把媒介技术视为核心议题的独特性所在，即突出强调了媒介技术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伊尼斯、麦克卢汉等，他们自身的学术渊源都部分来自于芝加哥学派，把媒介化理论追溯到更为历史漫长的研究学派显得过于遥远。本文将欧洲学派的媒介化研究视为“第二个媒介环境学派”，是传统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延伸和发展。

在整合两种“媒介环境”观过程中，舒尔茨（Schulz）的“媒介化”过程的四层次和夏瓦（Hjarvard）的“媒介化”研究为整合两个学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来源。首先，舒尔茨把媒介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归纳为以下方面：^{[3]（101）}（1）延伸（extension）：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人类的交流能力；（2）替代（substitution）：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活动；（3）融合（amalgamation）：将日常生活中不同层面的交流活动融合起来；（4）适应（accommodation）：行动者有意识地按照媒介逻辑从事交流活动。分析这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以及伊尼斯所推崇的“时间和空间的偏向”有紧密的联系，把媒介视为环境来认识，属于早期媒介环境学的分析视角。而第二、三、四层面则强调媒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媒介作为社会的“塑造力量”、现代社会按媒介逻辑参与到行动者的日常活动之中，^[32]这是属于“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其次，夏瓦的“媒介化”研究构成了对舒尔茨“媒介化”研究的补充，他将媒介视为独立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形式，以其独立的制度性要素面对社会进行重构，^[33]被称为“媒介化”研究的“制度化视角”。

以上舒尔茨“媒介化”的四个层面加上夏瓦“媒介化”研究的“制度化视角”，构成了理解与认识两种“媒介环境”观的五个层面（见表1）。五个层面包括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从技术的感知与延伸到媒介形式对传统面对面交流形式的替代，过渡到媒介与日常生活的交流与融合，再到以媒介逻辑来建构社会交流和传播活动，最后到最为宏观的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媒介的独立性与以媒介逻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运作方式。其中，第一个层面属于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作为环境”的基本观点，而第二到第五层面属于媒介化研究对“媒介化”环境的基本观点，五个层面融合了两种“媒介环境”观，形成了对现代社会“媒介环境”的全面认识。

表 1 两种“媒介环境”观的整合

	舒尔茨的“媒介化”	“媒介环境”观
第一层次	延伸	媒介环境学“媒介作为环境”
第二层次	替代	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
第三层次	融合	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
第四层次	适应	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
	夏瓦的“媒介化”	
第五层次	制度	媒介化研究的“制度化过程”

这一分析视角一方面体现为广义上对媒介与环境关系的讨论，把原有的具有科技生态倾向的媒介环境学派改造成新的现代媒介环境下媒介与人的中介互动和媒介与社会建制互动相结合的新型“媒介环境”，研究取向上既体现为部分差异，又体现为研究对象（媒介环境）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第二个媒介环境学派”弥补了传统媒介环境学派忽视政治经济因素和媒体主体能动性的缺陷，将欧洲学者对权力、政经因素的强调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者的人文主义学术视野相融合，实现了微观技术和文化感知与宏观政经关系和主体能动的统一，在扬长避短的同时又延续了媒介环境学奠定之初将传播媒介（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形式影响作为基本关注的研究命题，有机地将两种“媒介环境”观整合起来。

总之，在当下更为广义的“媒介环境”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广义的“媒介环境学”，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媒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实践，及时考察变动中的媒介环境因素对舆论生态、主流话语及社会变迁的影响，进而重塑对“媒介环境”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

参考文献：

- [1] 张晓锋. 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 [J]. 现代传播, 2010 (7) .
- [2] [英]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
- [3] Schulz, W.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19 (1): 87-101.
- [4] [美]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
- [5] 何道宽. 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3) .
- [6] 王润. 论麦克卢汉与芒福德“媒介”延伸观 [J]. 国际新闻界, 2012 (11) .
- [7]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79.
- [8] [美]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 [M]. 陈允明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9] [美]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M]. 杨晨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110.
- [11] 王冰. 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象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2.
- [12] 陈力丹. 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 (2) .
- [13] 李明伟. 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论丛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26.
- [14] Couldry, N.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8, 10 (3): 373-391.
- [15] Altheide, D. L. & Snow, P. R.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Sage. 1979.
- [16] [丹麦]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媒介化 [M]. 刘君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8.
- [17] 唐士哲. 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 [J]. 新闻学研究, 2014 (4) .
- [18] [英]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 [M]. 崔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9] 侯东阳, 高佳. 媒介化理论及其研究路径、适用性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5) .
- [20] Lundby, K. Mediatization: Concepts, Change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9: 277-292.
- [21] 陈卫星. 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 [J]. 国际新闻界, 2018 (2) .
- [22] Hawley, A. H. Human Ecology: Persistence and Change, *American Behavior Scientists*, 1981, 24 (3): 423-444.
- [23] 樊佩佩.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 (6) .
- [24] [美]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第2版) [M]. 邱泽奇, 张茂元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79-90.
- [25] 梅俊. 图绘新闻传播结构面像：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化理论 [J]. 新闻界, 2015 (11) .
- [26]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M]. 李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78.
- [27] 董峻. 技术之思——海德格尔技术观释义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0 (12) .
- [28] 钱佳湧. “行动的场域”：“媒介”意义的非现代阐释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3) .
- [29] Krotz, F.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7, 3 (3): 256-260.
- [30] Couldry, N.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2004, 14 (2): 115-132.
- [31] 胡翼青, 杨馨. 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 [J]. 新闻大学, 2017 (6) .
- [32] Hepp, A.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28 (6): 620.
- [33] Hjarvard, S.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008, 29 (2): 105-134.

[责任编辑：詹小路]